

父亲的医院

郑光

一个画面闪回：年轻的父亲，从裤兜里拿出一大串铜铁钥匙，几十把，沉甸甸，散开来，满手掌大。所有病区的大门小门，每把锁配一扇门。父亲带着我，逢山辟路般，钥匙在手上，一插一个准，对准一个小门孔，就哗啦打开一扇门，再打开一扇门。长长楼道，栅栏铁窗，脚踩厚木地板有回响。开门后，父亲和遇见的每个精神病患者好像都是朋友，拍肩，讲几句亲切的叮嘱和笑话。

父亲从小就引导我：大胆和精神病患者接触；他们不犯病时，往往是“人中精华”，要对他们很尊重。但我进父亲医院，却怕遇见他们。父亲说，在你身边自由走动的病人，已被药物控制住好。精神病医生，像高级降魔师，他们和暴躁、抑郁甚至执念欲死的病人交谈，然后开出对应药物，让他们从不正常回归正常。

父亲不是精神病医生，一个偶然，入了医院，属“专业不对口”。他大学读法律，没出过国，但英语天赋高。父亲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哈佛大学毕业的医院院长无缝对接，始于一次深入的英语交流。院长说寻到了宝，他有不少国外同行，交流精神医学问题，要备忘记录谈话，需有个“懂他的真理”。父亲以后成为院长办公室主任，院长私人秘书，医院工会主席。

六十年代初我读小学，逢休息日，父亲有时会带我去医院。一个是沪闵路北桥乡下的分院，一个是宛平南路零陵路口的总院。无论分院总院，父亲的医院都美如画，绿树成荫，繁花盛开，假山真水。父亲说，这都是按院长思路设计做的，“让病人怡情静神养心”。

北桥精神病分院，有很长一溜外墙，血红色，墙外大片农田，种水稻，也有油菜桃树。医院被四季变色的农村包围。去时是远行，乘郊区车。入院幽静，几幢花园洋房是病区。父亲在院里轻快散步，穿藏青中山装，衣服左上兜还插两支笔，一支圆珠笔，一支钢笔。我在后面碎步跟，脚下有方砖和鹅卵石的路。他对我讲院里的各种绿植：松、柏、柳、樟、枫、夹竹桃，还有隔开病区的一行行矮青竹，被修剪成士兵列队般齐整。

母亲说：父亲五十年代末在北桥分院有六、七年。我们那段时间住虹口，和分院两地隔40

公里，单向车程约3小时。我家边有条不干净的S形小河，在河里抓拿摩温的弟弟和我染上了甲肝。我们生病，父亲一周也只回家住一宿。母亲说，“他眼里只有单位”。每逢周六傍晚，全家等父亲，一起吃有鱼肉沾荤的团圆饭。那时分配的肉票一人一月二两半，鸡蛋一月大斤（5口人家以上）10个，我们全家8口人。家里平时几乎不吃肉，父亲回家那天集中买肉，好的时候，会吃到一块入味的红烧肉，或一块红烧排骨，阿婆烧的。

父亲进屋，会抚摸我们两男两女孩子的头，洒一遍亲热的雨。吃饭时父亲和母亲大多讲医院事。那年我刚上学，一次父亲说，院长调他正式回市区总院，我们的住房，也要搬到徐汇区的肇嘉浜路上，家和单位仅几站公交车。这样，父亲能天天回家。

后来，我在“市区总院”见到了和阿公年龄一般的医院院长，高大，和蔼，很端庄的长方脸，鼻梁上架着半圆形玳瑁眼镜。我看到院长和父亲讲英语时，会拊掌大笑。院长还俯身摸过我头，问“长大想不想当医生？”父亲这时望向院长，兴奋地搓手，好像院长真会培养我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。

童年岁月，我的头发大多由父亲医院的理发室打理。理发室在医院东南角，20平方米不到，两张黑皮剃头靠椅，两扇嵌进墙内的玻璃镜子。理发师王师傅是苏北人，亮闪闪向后梳的大包头。王师傅唇上常咬根烟为我剃头，理发室便烟雾弥漫。烟抽到最后，他会将烟蒂“噗”地随一口痰吐到门外的乱草地。理发室外，还有一大块医院食堂的自留地，种着毛豆南瓜丝瓜青菜等。医院食堂距理发室约两百米，饭香菜香在饭点前会飘溢过来。理发师一边闻着饭菜香味，一边对我说：你爸爸真想让你以后成为医生呢，像院长那样。

王师傅给我理发，父亲就在一边的镜子前寻把剃须刀，脸上抹白色的肥皂泡沫，自己剃去唇上、下巴、脸颊上的黑刺硬须。剃须毕的父亲一脸光亮，肤嫩，成了美男子。那天他嘲笑我在病人前的丑态：那个晚上，他让我坐在看露天电影的长条板凳上，周围是穿着一身黄色条纹衫的病人，他们用手摸我的脸。其中一个病人睁

圆充血的眼睛喊：“是郑医生的儿子啊！”我惊惧，哭泣，逃之夭夭。而在看露天电影的草地边，是戒备的医生护士。一个姓顾的护士长冲过来护住我，挡住围拢来看热闹的人。

王师傅闻之笑了，“郑主任啊，顾护士长对你儿子是真好。”

顾护士长我叫顾阿姨。顾阿姨臂粗力大，部队医院转业来的，嗓门洪亮。有一次在门诊室，父亲带我走过，顾阿姨正在制服一个精神错乱的武打男，被她一压臂膀不能动了，再吼一声，狂人立马无声。顾阿姨对我父亲说：你这儿子，以后当不了精神病医生——他对病人敏感过度。多年后，她又对父亲说：“你儿子喜欢作文，去跟我家老张学学吧。”没承想，大大咧咧的顾阿姨，家里藏着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老公，轻声慢语，满腹经纶，成为我人生第一个写作导师。

父亲对培养我做精神病医生无望，遂转移眼光到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周。小周大我十多岁，形象周正，在野战部队是卫生员，进院起始给父亲当办公室助理，父亲把他轰走，赶到徐教授的住处。徐教授叫小周脱下复员后还穿在身上的军装，要他走路不得手插裤兜。于是，小周穿上白大褂，苦读医书下病房，忙得跟我打乒乓球的时间也没有。

自我写作发表了文字，父亲便给了我任务，“写写我们医院”。我写医院前，让父亲“开后门”，潜伏病房一周，体验生活。八十年代中，我的一篇半虚构小说在报上连载，写一个老派的精神病医院院长，阻碍新派医生的革新治疗，新派医生坚持对病人“怀柔”。最后结局虽皆大欢喜，但老院长被定格在“守旧派”，新派医生也被一个貌美的女患者追求，陷入一片尴尬的冲突。父亲每天看连载，却一字不语。我知道，他失望了：没写出他一生敬重的“中国精神疾病治疗创始者的院长”。

赏识父亲才干的院长，在运动中被迫害并染病致死，这也是父亲一生至痛。

小周（已成为精神科主治医师）也看我写的文字，这样评价：“写得真是的啊，这故事编的，这情节写的。”——等于不说。顾阿姨那时已壮硕到肥硕，“顾阿姨是大老粗，看不懂。我们



家老张说，你看懂了，那小说还是小说？”

长时间读文字，一度，我晚上整宿失眠，焦虑，人要崩溃，遍访名医无效。父亲着急，请已是顶级专家的徐教授为我“治病”。徐教授不让我去住院，而要我晚上一次次到他家“喝茶水”。八十年代末他的家，屋小，一地鸡毛地混乱。盛夏，徐教授上身就穿破了几个洞的白圆领衫，摇一把蒲扇，脸有汗滴。他慢条斯理，很优美的语言涵养。父亲说，他就是原来院长最得意的弟子之一。他先一语不发，听我讲抱怨生活的话，讲心理生理不适，微笑，点头，然后点拨，舒缓。我问要用什么药物疗病，徐教授一口回绝：“吃什么药？人有低谷，调整心态就好。”徐教授的弟子小周见着我我也说，“去上班，天天扎到人堆里。你喜欢打乒乓，每天打。不舒服了，给我电话，半夜我也接。”顾阿姨那年刚退休，特上门，“你怀疑自己生精神病？真是神经病的想法。我们家太阳（儿子），月亮（女儿），每天都在等着看你这个哥哥‘神经兮兮’的文章”呢！

当我“心魔”彻底祛尽，小周赞了自己导师：“徐教授对你这一招，叫‘无药而治’，精神治疗最高境界。”

前几天，我去父亲医院总院，在大门内，看到一座庄重黑褐的半身塑像，宽脸，高额，厚唇，眼镜后面一双慈爱深邃的眼——是院长塑像，并镌有遥远去世的时间：1970年。

那些年，和之后过去的许多年，父亲深爱的院长，叫粟宗华：第一代中国精神医学专家，中国精神科社区服务创始人。而今，他的弟子，弟子的弟子，也早已桃李满天下。



上图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内的粟宗华塑像。下左：老上海都知道的“六百号”。下右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北桥分院。



油条

舒国治

油条又是极好的素菜中的配码。像茭白笋丝炒油条，是一道有变化的素菜。油条白菜丝，水兮兮的白菜中浮着金黄色油条，也令此菜一下子有趣了。丝瓜作为菜，只要稍炒，已会出水，端上桌宜用深盆一点的盘子。带汁的丝瓜，很像可以取名“丝瓜酪”似的。若以油条炒熟，是可以成为一盆素菜中的“油条丝瓜酪”呢！

有一年到福建泉州去玩，在开元寺徜徉了好一阵子，然后在附近古老巷弄中的二楼喝咖啡。喝着喝着，有人嗅到自曲巷飘来的油香味，都道：“好香啊，这是什么？”店家道：“你们鼻子真好，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炸油条小铺。我去买几根，你们尝尝。”

一吃，哇，还真香爽滑口。尤其是嘴里中原已弥漫着手冲咖啡的薄薄酸涩，这一下嚼入脆嫩的油条，竟然很配。吃到剩下的一小段，把它浸一下咖啡，再吃，也好吃。而那杯蘸过油条的咖啡，喝起来也没不好之味。

大约二十七八年前，我去爬河北保定附近的太行山（其实已过了满城，已接近川里），在相当高的一个小村前，见人在路边炸油条。是那种短短胖胖的，状至福泰，我们也买了几根吃。一吃，太惊艳了。同行者谓，这山里人自己榨的油好。当然，面粉也好。还有，露天炸，山高谷干，空气通透又没湿气，最能炸出好东西！

有一次过年期间的某个下午，在家人家里闲坐喝白葡萄酒，他左看右看，想找下酒菜，我说冰箱里搁着的两根油条拿来派用场吧。于是油条这下子用来配酒了，后来又找来一小块 blue cheese，咬一小段油条，嚼几屑 blue cheese，再啜一口酒，哇，也是那么搭啊。油条又是极好的陪伴物。我最喜欢注意水煎包里的诸项馅料，像粉丝、土豆腐屑，偶还有油条末末，那就精彩了。他们这些馅料，皆为了陪伴韭菜或高丽菜这主料。但有了这些百姓极富生活智慧的馅料（像粉丝，太聪明了），油条也是。当然豆腐屑或土豆腐屑皆是），这样食物，顿时有神了！

有些餐馆，为了做创意菜，喜欢把食料（像蚵仔）塞进油条里，先进油锅，再烩。这种菜，我几乎很少动筷。主要油条你若视它为娇美物，如何可以这么折腾？那道菜乌漆嘛黑的，里面还不情不愿地硬填了东西，这种手工菜，或说创意菜，实在太不了解油条之为物矣。

油条最好的搭配物，是白粥。还不必是海鲜粥、皮蛋瘦肉粥、及第粥等这些有料的粥，是纯净的白粥。主要是享受它的清爽配搭。白粥最好煮得稠些，陶锅小火，慢慢煮成粥面泛出白亮白色。以这样的白粥，配炒得干干的雪菜毛豆、荷包蛋、刚出炉的板上豆腐一方，淋上几滴酱油，最后加上一碟碎成小段的油条，便是千古不移的最文雅早饭了。

境”。（《诗论》）以宗白华的“物我对立”与“物我浑融”的区别观念，王国维与朱光潜对诗境的看法正相反对。宗白华关于中西艺术比较的论断，犹如欲断陶诗之“望/见南山”，立意即错，故不免无谓臆断。

19世纪转向20世纪以来，关于中国文化的言说始终有一个急迫的动机——回应西方。在将西方文化作为对比对象的过程中，这个回应西方文化的急迫动机无疑促进了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反思，但是，也很可能，准确讲，事实上也造成了在中西对峙中对母语文化的一元化和简化思维。从20世纪转进21世纪，我们当代学者在拥有更加现代、高效的交通条件和学术研究工具的前提下，应当以超越前辈学者的视野和思维，更深刻广泛地探讨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。这就是需要我们更活跃、更自由的游与思。

“以神为马”出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。子祀询问病危的子舆是否厌恶死亡。子舆回答说：“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为鸡，子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为弹，子因以求鸢炙；浸假而化子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子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”我借庄子这个词语表达对学术的无限精神和自由追求。

2024年8月11日，英、法、意三国之行前，酒无肴

（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肖鹰文集《以神为马——中国美学的游与思》自序）

序跋精粹

以游为学，以神为马

肖鹰

庄子说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”在有涯与无涯的对立中，庄子开出的哲学药方是以“游”为学。
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“尧何以资汝？”意而子曰：“尧谓我：‘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。’”许由曰：“而奚来为积？夫尧既已黜汝以仁义，而刚汝以是非矣，汝将何以游夫逍遥恣肆转徙之途乎？”意而子曰：“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”许由曰：“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”意而子曰：“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锤之间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蹀而补我剝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”许由曰：“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。吾师乎！吾师乎！畜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谓游已。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

意而子与许由这则对话明确表达了庄子的“游”的人生价值理想，即不受既有成规和观念束缚的自由活跃的生命活动，“与造物者为友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”。以庄子的“游”的观念导航学术，亦可说是“非中心无边界”。但是，庄子的深刻处必须从两个要义开拓出来：其一，真实而切身的感悟，对于庄子，学问不是概念（名言）的捕捉，而是对生命的“不测”和“无穷”的感悟，这是“游”的本质所在；其二，学术不是一个可以占据阵地或完成终结的事物性活动，相反，它是因为无限开放而生气无穷的。人生之“游”归根到底是天地之“化”——“万化而未始有极”。

陶渊明的《饮酒·其五》诗中的第六句，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《文选》中为“悠然望南

山”。苏轼认定陶渊明原诗是“见南山”，而“望南山”是“俗本妄改”。他说：“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’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‘望南山’，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。”（《东坡题跋卷二·题陶渊明饮酒诗后》）苏轼做此论断之后，通行本《陶渊明诗集》均采纳“见南山”为陶渊明原作。近十数年来不少文章反对苏轼论断，论者所据要点有三：其一，《文选》是迄今发现最早收录陶渊明此诗的版本，苏轼之说无版本支持；其二，陶渊明诗多出出于纪实，综合文献与地理环境考察，陶渊明“望南山”为纪实；其三，在陶渊明前后诗人中寓“望”之诗文是一流行传统。

驳苏论者凡此种种理由，或可以质疑苏轼论断，即陶渊明作诗非必然“见南山”而不可“望南山”。但以此种种理由为据断定陶渊明作诗只能“望南山”而不可“见南山”，则是拘执学术的态度臆测陶渊明。驳苏论者认为，采菊东篱下，于南山必须举首远望而得以见之。王维诗《终南别业》有名句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以驳苏者的诗理讨论，“水穷处”在山谷中，王维岂可“坐看”云起！借王诗讨论诗，“望南山”可，“见南山”又为何不可？

在贾岛“推/敲月下门”不定的时候，韩愈为之定为“僧敲月下门”，后世传为佳话。但朱光潜说：“‘修改’就是调配距离，但是所调配者不仅是语言，同时还是意境。比如韩愈定贾岛的‘僧推月下门’为‘僧敲月下门’，并不仅是语言的‘推’进，同时也是意境的进步。”“推”是一种意境，“敲”又是一种意境，并非先有“敲”的意境而想到“推”字，嫌“推”字不适合，然后再寻出“敲”字来改它。”（《诗论》）朱先生之论深刻

地揭示了诗人创作的微妙而且变化的心意（意境），他人是做不得主的。白居易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》诗说：“时倾一尊酒，坐望东南山。”韦应物《答裴税》诗说：“采菊露未晞，举头见南山。”同是唐人，仿陶却是“望”“见”两别。陶渊明已做九泉古人，死无对证之下，要“坐实”他之原作“望南山”还是“见南山”，这只能是活人替死人做主了。

近百年以来，许多关于中国美学、中国艺术“是什么/不是什么”的论断，验之以中国文化的多元丰富，未免失于简单臆断。比如，关于中西对比，宗白华有一个结论性的、而且被后世广泛引用的论断：“中、西画法所表现的‘境界层’根本不同：一为写实的，一为虚灵的；一为物我对立的，一为物我浑融的。”（《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》）这个论断无论针对中国绘画，还是西方绘画，都是简单片面的，面临着重要的艺术史实的驳诘。在艺术创作中，“写实”与“虚灵”是任何艺术家都必然面对而且必须处理的矛盾，因为艺术不是对现实的复制，“A representation is never a replica”（E.H.Gombrich, Art and Illusion），任何手法和风格都是在这对矛盾中的运用。如果将“写实”与“虚灵”用作艺术风格的描述，则中西艺术都包含着这两种风格，而且都具有这两种风格的伟大作品。至于“物我对立”与“物我浑融”，是纯粹主观性的判断。王国维论诗歌，指出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，认为前者是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，后者是“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。（《人间词话》）朱光潜却认为，王国维所谓“有我之境”其实是“无我之境”或“同物之境”；而其所谓“无我之境”，却是“有我之境”或“超物之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